

本世紀三〇十年代

中國的發展經濟學說

周代啓

福建教育出版社

周代啓著

序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张 磐

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是由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来研究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即如何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问题。初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局限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正处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注意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1949年建国后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八十年代后才有一些学者提出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乍看起来，中国至少在八十年代以前与发展经济学无缘。其实不然，系统的发展经济学说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在中国产生，并且已形成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颇具影响的思潮。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欺凌，激起了一批先进的学者积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寻找中国发展之路。中国三四十年代发展经济学说的兴起，表明经长期探索，中国先进分子已经选择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周代启同志1991年发表的《中西方发展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之比较》，在国内第一次初步证明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兴起的客观事实和早于西方的观点，目前已被一些国内学者接受。周代启同志这次出版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是在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充实而成的。专著体系新颖、完整，例证有力，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必将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伍启元的“两缺口模式”，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刘大钧、马寅初、伍启元、谷春帆、方显廷等人的经济发展战略，杨叔进、韩德章、谷春帆、伍启元、陈振汉等人的二元经济模式下的农业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源等等理论的提出，都极其雄辩地证明了这些理论早于西方。这确实令人十分振奋，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爱国信心有一定意义。又如韩德章的农村经济现代化，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伍启元、谷春帆、马寅初、蒋廷黻、漆琪生等人的土地制度改革，谷春帆、刘大钧等人的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境界，陈振汉、刘大钧、丁振一的工业区位，褚葆一、宋则行的保护贸易，谷春帆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张闻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马寅初、谷春帆的通货膨胀危害与治理，杨叔进的宏观调控体系等等理论的提出，不难看出其中有些观点，不仅早于西方，而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周代启同志从繁多的三四十年的经济资料中独辟蹊径，整理出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对我国发展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是个重大贡献，填补了一大空白，相信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周代启同志思维敏锐，勇于开拓，勤于笔耕，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实践工作能力，他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主要从事开放研究工作，现在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50多篇论文，多篇获福建省联席咨询会议一等奖。当然，这部专著还带有探索性，希望作者继续在这一领域深入研究。

1996年9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张 磐 (1)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节 西方广狭义的发展经济学说	(3)
第二节 中国广狭义的发展经济学说	(10)
第三节 中国广狭义发展经济学说的分野依据	(23)
第四节 中国发展经济学说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28)
第二章 资本筹措与经济增长	(36)
第一节 工业化的启动资本形成	(36)
第二节 工业化的资本形成途径	(54)
第三节 经济增长	(63)
第三章 工业化目标模式和发展战略	(75)
第一节 工业化目标模式	(75)
第二节 工业化发展战略	(91)
第四章 人力资源配置和两元经济模式	(108)
第一节 人力资源供求	(108)
第二节 人力投资	(120)
第三节 节制过快的人口增长	(124)
第四节 两元或三元经济模式	(128)
第五章 农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区位	(140)
第一节 韩德章的农村经济现代化筹划	(140)
第二节 土地制度改革	(157)
第三节 工业区位	(167)
第六章 对外经贸关系	(183)

第一节 对外贸易与工业化·····	(183)
第二节 保护贸易与工业化·····	(199)
第三节 外商投资与工业化·····	(219)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与工业化·····	(228)
第七章 国际金融的攻防和协调·····	(239)
第一节 货币的攻防战·····	(239)
第二节 本位制的选择·····	(247)
第三节 汇率确定规则·····	(255)
第四节 国际收支平衡·····	(272)
第八章 经济体制的选择和运作·····	(277)
第一节 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	(277)
第二节 经济体制的选择·····	(291)
第三节 经济体制的运作·····	(302)
第九章 宏观经济的治理和调控·····	(315)
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危害与治理·····	(315)
第二节 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	(327)
第三节 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334)
第十章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的历史	
地位及现实意义·····	(346)
第一节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在 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	(346)
第二节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在西 方发展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	(356)
第三节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的现 实意义·····	(358)
后记·····	(366)

序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张 磐

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是由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即如何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问题。初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局限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正处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注意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1949年建国后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八十年代后才有一些学者提出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乍看起来，中国至少在八十年代以前与发展经济学无缘。其实不然，系统的发展经济学说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在中国产生，并且已形成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颇具影响的思潮。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欺凌，激起了一批先进的学者积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寻找中国发展之路。中国三四十年代发展经济学说的兴起，表明经长期探索，中国先进分子已经选择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周代启同志1991年发表的《中西方发展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之比较》，在国内第一次初步证明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兴起的客观事实和早于西方的观点，目前已被一些国内学者接受。周代启同志这次出版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是在1990年上海复旦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充实而成的。专著体系新颖、完整，例证有力，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必将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伍启元的“两缺口模式”，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刘大钧、马寅初、伍启元、谷春帆、方显廷等人的经济发展战略，杨叔进、韩德章、谷春帆、伍启元、陈振汉等人的两元经济模式下的农业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源等等理论的提出，都极其雄辩地证明了这些理论早于西方。这确实令人十分振奋，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爱国信心有一定意义。又如韩德章的农村经济现代化，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伍启元、谷春帆、马寅初、蒋廷黻、漆琪生等人的土地制度改革，谷春帆、刘大钧等人的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境界，陈振汉、刘大钧、丁振一的工业区位，褚葆一、宋则行的保护贸易，谷春帆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张闻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马寅初、谷春帆的通货膨胀危害与治理，杨叔进的宏观调控体系等等理论的提出，不难看出其中有些观点，不仅早于西方，而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周代启同志从繁多的三四十年代的经济资料中独辟蹊径，整理出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作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对我国发展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是个重大贡献，填补了一大空白，相信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周代启同志思维敏锐，勇于开拓，勤于笔耕，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实践工作能力，他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主要从事开放研究工作，现在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50多篇论文，多篇获福建省联席咨询会议一等奖。当然，这部专著还带有探索性，希望作者继续在这一领域深入研究。

1996年9月30日于北京

第一章 绪 论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它既注意到经济增长，又照顾到分配的平均、社会的进步以及国际关系的改善等，因此颇为人所热衷。一般人认为，发展经济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由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由中国学者研究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说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业已孕育、萌芽，并已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思潮。虽然三四十年代的发展经济思潮基本上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理论的范畴，但是，它主张实行有“节制”的自由经济，也就是有“节制”的市场经济，在今天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

必须说明一点，发展经济学有广狭义之分。西方发展经济学有这个分野，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也有这个分野。分清广义的发展经济学和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界限，有助于我们建立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西方广狭义的发展经济学说

一、西方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1) 研究对象和范围

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系指一国或地区国民生

产总值的增长；而经济发展则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的变化和进步。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相反，分配不公、社会事业停滞不前，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经济增长最终也将受到严重的制约。

狭义的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任务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或现代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战略。其研究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60年代初，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八十年代后才有人比较注意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纳入研究范围。我国的新发展经济学论者明确提出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也纳入研究范围。从实践上看，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报告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材料比较早就这样做了，只不过这些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研究略欠理论上的概括。

(2) 形成和发展过程概述

一般认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它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各不相同，选择的道路和方式也不相同，但是它们原有的经济模式是基本相同的，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印记，都存在如何加快经济独立的步伐，即如何发展的问题。必须指出，曾经长期受宗主国压迫和奴役的发展中国家，国民文化素质低，还缺乏致力于研究自己国家经济问题的学者，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就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越俎代庖了。这些经济学家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所

以，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属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范畴，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研究殖民地经济，但是他们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归咎于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缺乏等等客观原因。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酿成的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引发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迫使这些经济学家反思。他们感到昔日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若没有一点发展，也会制约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再加上战后有强化平均主义和人道主义趋势，发展经济学就应运产生了。

初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60年代初，下同）的发展经济学以反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基调比较明显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占主要地位。因为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短缺、刚性、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等结构上的特点；而新古典主义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主导、边际调节和自由贸易等主张，不符合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而结构主义强调政府干预，主张内向发展战略，实践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初期社会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从60年代中后期起乃至延至于今，出现了和初期经济发展不相一致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结构上制约已不那么明显，但是经济发展的许多深层次矛盾不断显露。诸如分配不均、人口压力、债务负担沉重、科技教育落后、工农业生产脱节、地区发展不平衡、贸易条件继续恶化等等问题都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以致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迫使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反思。他们感到按照结构主义理论作出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而以进口替代辅助国内工业发展战略经过较为宽松的初始阶段后，便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相反的，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作出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得

比较稳步的发展，对外扩大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从而促进了国内经济繁荣。因此，这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特点：更多地采用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和方法；更多地采用经验分析方法；强调涉外经济部门发展的重要性；批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转而重视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劳动就业、农业生产、环境保护以及人口等问题的研究；一般的经济理论逐步转为特殊具体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一派激进的发展经济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他们的发展理论未形成主流。

二、西方广义的发展经济学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除包含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外，还包含从重商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前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指出，前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世界上最先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国家。从这个意义讲，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development 问题。

前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把金银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同时主张发展海盗式的对外贸易以求国家财富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思想虽然在实践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是毕竟理论上是片面、肤浅，甚至错误的，况且也缺乏系统性。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显露出理论的缺陷。因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过程，而不是重商主义者认为的来自流通过程。重农学派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认识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但是，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产品才是国民财富，并且结论说，只有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增加国民财富。因此，从这一点看重农学派仍然未脱离重商主义者

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那样片面、肤浅认识的窠臼。

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使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相当正确地阐述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并提出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加快了资本积累，加快了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原理。他还将该原理适用于国际社会的分工，提出自由贸易可促进贸易国双方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李嘉图是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是完成者。他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比较成本说”，全面论证了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李斯特认为，一国发展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程度，他认为，国家的制度、法律、宗教等因素也是生产力的重要源泉。他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为蒙昧（狩猎）、游牧、农业、农工业和农工商业等五个阶段，认为第四阶段工业还幼稚，应实行差别性的保护贸易政策。马克思主义者汲取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合理部分，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越发展，其生产关系越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代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观点。

新古典学派主张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也提倡自由贸易，认为只要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就能使经济获得增长和发展。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也暴露了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为了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学派认为，国家要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实行贸易壁垒政策，就可摆脱经济危机和解决社会失业问题，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内容有实施赤字财政、膨胀通货，举办公

共工程，减轻资本家的租税和刺激消费等。

三、前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对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前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只是从一个侧面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显得比较零星、缺乏系统性，还远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前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对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受前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影响，大致产生了狭义发展经济学的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是：一是古典、新古典学派的影响产生狭义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流派；二是受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产生结构主义流派；三是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产生激进主义流派。

(1) 凯恩斯主义对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理论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但是他采取的宏观分析方法对狭义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流派影响很大。比如，凯恩斯在宏观分析模式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投资和储蓄关系、货币是宏观经济的内生变量等，许多依照结构主义理论作出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在制订宏观经济计划时都采用了凯恩斯这种分析办法。又如，钱里纳提出著名的“两缺口模式”，虽然该模式主要为了表述利用国外资源的重要性，并指出利用国外资源必须以国内资源为代价换来的，但是不难看出“两缺口模式”受凯恩斯分析方法的影响。再如，纳克斯提出有名的“贫困恶性循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客观存在两个恶性循环，一是反映在供给方面的循环；一是反映在需求方面的循环。两个恶性循环互相作用，使经济陷于低发展水平恶性循环之中。这显然受凯恩斯的收入决定和总供给与总需求必须平衡等基本观点的影响。

特别指出，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观点，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影响最大。因为刚刚走向政治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普遍存在结构性的特点，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和领域极其有限。为了使国家在短期内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就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计划或其他干预政策把有限的资源投向国家经济建设最急需的地方去。

(2) 古典、新古典理论对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影响为主流，但不是说二战以前的古典、新古典学派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一点也没有。这时期新古典学派影响而产生的新古典主义流派也看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有限。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在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同时，主张尽最大可能用“看不见的手”驾驭经济。

60年代初中后期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结构性的制约已不很明显，但发展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新古典主义流派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开始占了上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践过程中也加深了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从而使新古典流派的理论更多地被采用。新古典流派的影响就逐渐越来越大。

(3)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采用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形成了激进主义流派。比如，普雷维什、缪尔达尔从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阶级关系状况和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去分析支配和依附关系，认为国际国内存在的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是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

应该指出，前期的三种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

经济的影响，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推动经济理论发展。比如，萨缪尔森于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初步分析》，就把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结合，称之为“新古典派综合”。又如，结构主义论者认为资本筹措是实现工业化的源泉，就包含了新古典学派的积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的思想；而新古典流派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也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某些程度的干预。60年代中后期后这种互相渗透更明显，发展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三个流派之间互相兼容。比如，世行等国际性组织的报告中表现出来的观点，基本上是对这三种流派的兼包并蓄，以致有人认为象世界银行这类国际性经济组织报告的观点，可独立于发展经济学三个流派之外成为第四流派。其实，三个经济流派的一些主张之所以都被世行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接受，是因为三个发展经济学流派解释经济现象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新古典流派的合理性，在于他们能正确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现象，其边际调节、市场修补是能保持经济朝着健康轨道运行的有效手段。而结构主义的合理性，在于他们能正确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暂时或短期的经济现象，其运用政府干预办法，也是使发展中国家能迅速摆脱困境的最有效办法。激进主义流派的合理性，在于他们强调，不应当只注意到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强调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发展权。

第二节 中国广狭义的发展经济学说

上面说过，中国发展经济学说也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孕育、萌芽、兴起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

一、中国狭义的发展经济学说产生的背景

(1) 狭义的发展经济学说产生的土壤。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人口压力沉重，失业严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贸易逆差和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经济命脉大多数为列强所掌握，带有浓厚的殖民地烙印。但是还没有完全殖民地化，社会上仍有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国家主权由于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而丧失了大部分，但是国家政权还存在。因此，社会上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这一主要矛盾外，必然还存在着国家民族与列强之间摩擦和斗争。一百多年来在与列强摩擦和斗争中，大多数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识到，经济侵略比武力侵占更可怕。只有国家经济力的增强，才是保卫国家的根本之道。比如郑观应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所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见解，强调只有讲求物质才会“立国新世，有恃无恐”^②。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则指出，帝国主义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侵略中国，要使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条约。”显然孙中山的主张切中要害，但是在短期内无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条件下，他仍不失时机地主张发展中国经济。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他就主张利用外国战后的剩余资本，有计划地完成中国工业化任务。虽然无法实现，但是孙中山持乐观态度。因为他认为世界经济联系对双方都有利，战争无论胜负对双方都不利。令人赞叹不止的是，他在《建国方略》中还为中国沿海港口开发绘制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初编，卷三，第11页，图书集成局，光绪24年版。

② 康有为：《清历工艺奖创新折》，见《戊戌变法》（二），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了详尽的蓝图，至今仍有实践意义。

1930年取消了协定关税，中国取得初步的海关自主权。1934年又把海关的管理权收归国有，实现了关税完全自主。这为民国政府废除国内苛捐杂税，改革税制，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推行法币制度，这对稳定法币价值，安定国内金融行市，解决金融恐慌，发展对外贸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币制改革虽有许多重大缺点，但是在改革的头几个月，就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从1930—1936年，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较快。1936年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工业总产值为12274千万元，比1935年的11040千万元增长了11.1%，比1927年的6701千万元增长了83.2%。农业总产值1936年为1989千万元，比1935年的1879千万元增长了5.9%。^①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理所当然地被废除。1942年前后英美又自动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国基本上有了政治的独立性。1942年英美苏中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经济能顺利发展，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加强政治的独立性。因此，这时期发展经济以保卫中国来自不易的政治独立的呼声很高。这表现在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年间大后方的大开发。民国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中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工业，但颇注意农业的发展，并给农业提供许多优惠条件。因为农业首先为人民和前线战士提供了衣食费用，其次又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1942年大后方稻谷种植面积较1936年增加了20%，麦子产量增长了40%。棉花产量1942年比1937年增长了76%。农业的发展牵动了交通、工矿的

①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参见第248—250页，1948年版。